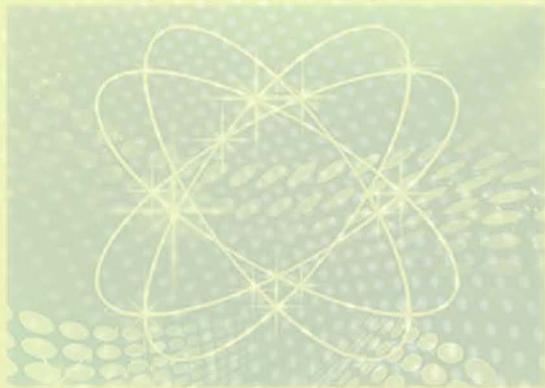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思想研究

杨 华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思想研究

杨 华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研究 / 杨华著.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316 - 6760 - 5

I. ①贝… II. ①杨… III. ①资本主义—文化—研究
IV. ①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6887 号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研究

Beier Zibenzhuyi Wenhua Maodun Sixiang Yanjiu

杨 华 著

责任编辑 王宇彤 郭 翀
封面设计 鲲 鹏
责任校对 肖 咏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光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6 - 6760 - 5 定 价 28.60 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 www.hljep.com.cn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451 - 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451 - 82529347

如发现盗版图书,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0451 - 82560814

序 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在杨华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展示了作者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研究,及对解读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关系的一些思考。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当然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或。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或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或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轴心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

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针对文化精神的断裂以及文化对经济与政治制衡力量的丧失,贝尔提出解决双重矛盾的双重方案:回归宗教与公共家庭。这种诉求体现贝尔所代表的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学科界限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本身既是人之为人的属性,是由当下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困境所决定的。在现代,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贝尔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分析,无论是其内容、方法论还是其介入社会现实的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矛盾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尽管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但却凝结了作者的探索和思考,表明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如果本书能给读者一些启迪,也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了。祝愿作者以此书的出版为起点,在文化矛盾思想研究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下去,并取得新的成果。

丁立群

2012年10月30

目 录

| | |
|-------------------------------|----------|
| 导论 | (1) |
| 第一章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背景分析 | (22) |
| 第一节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社会背景 分析 | (22) |
| 第二节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理论渊源 | … (34) |
| 本章小结 | (56) |
| 第二章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逻辑、 内涵与结构 | (58) |
| 第一节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逻辑演进 | … (58)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涵与本性 | … (77)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结构 | … (89) |
| 本章小结 | (105)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修复方案—— 重建宗教伦理 | (107) |
| 第一节 人类与世界认同方式的变化及其危机 | … (108) |

| | | |
|------|----------------------------------|--------|
| 第二节 | 走向“新宗教” | (115) |
| 第三节 | “新宗教”可能性分析 | (133) |
| | 本章小结 | (138) |
| 第四章 |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破解方案—— 建构新政治哲学 | (141) |
| 第一节 | 新政治哲学的物质基础: 公众社会 | (142) |
| 第二节 | 新政治哲学建构的途径 “公众家庭” | (146) |
| 第三节 | 新政治哲学的价值论优势 | (152) |
| | 本章小结 | (176) |
| 第五章 |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限度 及其启示 | (179) |
| 第一节 | 理论限度 | (179) |
| 第二节 |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理论地位 | (193) |
| 第三节 | 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 (200) |
| | 本章小结 | (210) |
| 后记 | | (211) |
| 参考文献 | | (221) |

导 论

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那是愚昧的年头，
那是怀疑的时期，
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失望的冬天。

——摘自《双城记》

这是狄更斯《双城记》开头中对时代的负面描写。之所以选取这些短句来做题记，是因为它们很能表达“次债危机”下西方人的心境和人们对生存困境的直观感受：惶惶然，不知向何处去。从直观的现象来看，今天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是一场经济性的危机，然而，从本质角度看，它表征着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

一、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出场

之所以说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是因为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意义表征，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精神的危机，归根结底都是文化的危机。在此次金融危机所呈现的阶段性结果中，西方科技万能论、历史进步论、市场主义和乐观主义等传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弊病在日常生

活层面全面呈现出来。更为严重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危机感受,已经从知识分子的敏锐捕捉和反思、社会群体的决策参考扩展到日常大众社会心理的震荡。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深层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基础和意义支撑全面坍塌,大众陷入巨大的失落、空虚、茫然失措和无所适从的黑洞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症候,金融危机不但标志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强烈激化,而且标志着整个人类精神的持续恶化。一句话,金融危机实际上暴露了现代人的文化危机。衣俊卿教授曾指出:“我们必须确立的一个历史事实是:20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一场贯穿整个世纪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自我冲突和自我毁灭,另一方面通过欠发达和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确立理性文化模式时所遭遇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冲突表现出来。”^①诚然如此,文化无所不在的力量和多种多样的冲突体现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矛盾已经成为我们最鲜活、最深刻的感受之一。

事实上,现代西方人的文化危机并不始于当下,而是在当下以最激烈的方式暴露其狰狞的面目。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主体性的自我膨胀使人们乐观地相信,人们可以凭借人的理性及其现实体现——科学技术扩大对自然、社会和他人控制。然而,人们学会了控制自然的技术,却不知如何控制技术本身,人类不但无法控制技术,技术本身反而成为控制

^① 衣俊卿. 20世纪的文化批判[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20.

人的恶魔。这样,创造了人化自然的主体,变成了被新自然所束缚的客体。更为严重的是,在此过程中,人的价值地位发生了变化,人自身从存在的目的变为存在的手段,从历史发展的标志变为历史进步的工具和附庸。这种情形势必引起人这一“思想的苇草”的理性反思和审美逾越,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自由追求与其文明成果的制度权力之间日趋激烈的冲突所展开的文化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累积形成,在后工业社会更加凸显。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通过五月革命的爆发而走上历史的前台,世纪之交,这种文化矛盾随着全球化的过程扩散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成为每一个现代人自身生存都可能面对的危机,新世纪的金融危机则让人们意识到,文化危机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正在经历的危机。

如果说,以往人们是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作为人类文化矛盾的一个特殊的个案来研究,那么今天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问题已经作为市场经济一个普遍的、无可回避的问题而进入人类的视野,成为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主题之一。对它的深入考察、思考、阐明和解决刻不容缓。因此,无论是西方思想界,还是非西方学术界,人们都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展开了深刻思考和反思。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成为19世纪至今的跨越三个世纪的焦点问题,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从知性认识到理性反思,通过我们对已有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划界和梳理,贝尔以著作形式主题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以一种中介视角的研究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1976年,贝尔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冲突理论。站在保守立场,贝尔批判后现代主义在文化领域中造成的混乱,主张规范文学艺术,重建宗教信仰,恢复社会秩序。众所周知,理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绝非无根之浮萍、空穴之来风,而总是有其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逻辑。贝尔之所以进入我们的视野,不只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好书,也不只是因为他为这本书取了一个好名,而且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人类性的问题,因为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这使得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哲学研究,不仅改变了西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分析的话语结构,而且突显出其自身超越以往意识哲学和社会学的哲学维度。这种哲学不仅引发和推动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后现代研究向度,而且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复杂谱系显现出来。那么,具体说来,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独特性体现在何处?它是如何改变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话语结构的?这种改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于西方社会和我国本土文化矛盾研究又有什么启发和意义呢?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写作动机和研究内容。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社会存在首先引发了西方文学艺术领域对其表征,进而哲学社会科学对其进行理论反思。无论是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马克思,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其可能引发的困境并对其加以批判。非理性主义者主要从逻辑的角度批判理性主义自我膨胀的可能的恶果,空想社会主义则批判自由市场的无序竞争、残酷的经济剥削、私有制经济的不平等导致政治的

不平等、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进而寻求超越之道。马克思则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做以最为深刻的揭示,并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共产主义方案。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是尼采。尼采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批判得极其激进,以至于有意违背逻辑,故意打破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界限。他以极富哲理的诗、箴言、散文和小说等多种表达方式来批判资本主义对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背弃,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人们视为疯狂。与尼采不同,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更加精致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流及丧失,这一工作经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宣介而引起广泛的注意。20世纪,无论是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批判等都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展开深入的研究。

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非常复杂的矛盾体系,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上两点就决定其研究的视角必然是多元多样的。为了研究方便,我们这里以文化的内涵为基点对已有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做一个简单的划界。

(一)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社会视角

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社会视角是指,这种研究所指涉的不只包括社会意识领域的矛盾,而且指涉经济、政治等社会存在领域的矛盾。在这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生活矛盾,它的理论前提是大文化观念,

即文化是人实践活动中的人化,无论是其图景、结果还是过程。这个文化概念既包含器物层面、精神层面,也包含活动层面;既具有历史、未来维度,也具有现实维度。空想社会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大都在这一路向上,这些研究的共性在于它们所关涉的是全社会的整体研究,应当说,这一视角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广义视角。

(二)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领域视角

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领域视角是指,这种研究往往直接指涉社会的意识领域,它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世界、意义生活,所以这种研究首先是在文学艺术领域生发,然后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展开,这种研究的共性是关注文化精神与精神文明的冲突。从道德立场批判科技进步带来道德堕落的卢梭,宣扬现代酒神精神——权力意志的尼采、批评欧洲文明危机的胡塞尔等人主要采用这种视角,“上帝死了”“欧洲科学的危机”话语等是这种研究的典型表达,可以说,这种视角下的研究是狭义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社会视角对文化领域的关注并不比经济、政治领域更多,相反,更多时候,它更侧重于对经济、政治或市民社会的研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领域视角则从文化领域出发,对经济、政治或市民社会则采用表现、表征的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弊病在于它们都采用单极化的研究方式,而且各执一极。前者存在着一个预设,即社会存在问题的解决必然带来社会意识问题的解决,即社会意识完全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后者存在一个理论前提——社会意识的问题必须经由意识来解决,即人们经常说的“思想

的问题只能通过思想来解决”，因此难免遭人诟病。理论研究的发展，现实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要求人们必须更新视角，转变观念。

（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研究的中介视角

所谓中介视角，就是在理论研究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两个本来在实践中就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矛盾形式关联起来。这种关联不是二者简单地叠加，而是将二者互为中介机制系统地显现。之所以可能在理论上实现两种矛盾的关联，不在于二者的范围大小和数量多少，而在于二者的系统结构、辩证互动。贝尔自觉地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视野与韦伯探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视角结合起来，探寻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潜在历史原因。在他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内部的矛盾，他所研究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文化矛盾，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它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矛盾”^①。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矛盾既不是单纯由于经济基础所导致，也不是由政治冲突所引发，“我用对抗原则看清了潜藏在社会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内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②。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领域各自围绕自己的轴心原则运转而生的冲突与三大领域内尤其是文化领域内冲突之间互为中介，多重作用的

^①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 [M]. 严蓓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6.

^②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 [M]. 严蓓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7.

结果。这使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穿越众多学科的界限,在经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社会思潮之后仍然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以其理论的特殊性磨出光亮,历久弥新,越发显得冷静、长远和切中要害。

既然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独特而重要,人们对于贝尔的这一思想研究情况是怎样的呢?人们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还有哪些空白,分析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状况构成我们这项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二、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研究状况

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自律体系、政治领域官僚制度、文化的反制度追求及这三者各自内部的冲突分析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结构和机制,他的工作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一) 国外研究状况

由于贝尔近乎散记的写作风格集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与韦伯文化精神分析等思想之大成,所以,国外学术界对贝尔的研究表现出“三多三少”的特点,响应者较多,反驳的人较少;引用贝尔思想的人较多,而从事理论分析的人较少;针对具体观点研究的人较多,针对总体理论研究的人较少。

在响应的人中,利奥塔将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激化的特定空间——后工业社会吸取到其《后现代主义状况》的分析中,通过知识将后工业与后现代连接起来。这显然忽视了贝尔关于三大领域各自的轴心原则,贝尔也觉得利奥塔的这种处理有点混淆问题。他说:“就像我在这里指出的,文化和经

济遵循不同的逻辑,尽管它们之间互有影响(比如技术在绘图或声音的制作和放大中的角色),但这两个领域是截然分离的。技术发展根据的是变化替代的线性原则,更有效、更具生产性的技术胜出。而文化中没有这样一种变化原则,新发展拓宽了文化之想象作品的所有成果。”^①

哈佛—燕京学社的杜维明和黄万盛等人认为,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在现代化的层面上反思启蒙的”,他们赞同贝尔的“三个主义”说,并由此探索儒家重新认识和批判启蒙的可能乃至可行的道路。^②应当说,他们对贝尔的理解是准确的。然而,如果不深入分析中西文化矛盾的语境相关性,在中国采用“三个主义”思路是否得当?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

在反驳贝尔具体观点的学者中,哈贝马斯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在哈贝马斯看来,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分析过程中,肯定社会现代性的同时否定了文化现代性,贝尔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无情打击,认为现代性和集中体现现代性的现代主义已经死了。这在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工程的哈贝马斯看来,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哈贝马斯当然不会同意贝尔的观点,所以他将贝尔归入老保守派的阵营。单就文化领域来说,哈贝马斯对贝尔的把握还是准确的。之所这样说,是因为贝尔曾指出,“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力

^①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严蓓雯,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313.

^② 杜维明,衣俊卿.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J]. 求是学刊,2009(1): 8.

量——在审美形式或内容上都具创造性——现代性已经终结了”^①。“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对自我的可悲赞颂——这个自我被掏空了内容，却通过表演革命戴上假面，假装自己意义非常”^②。贝尔就反复说自己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然而，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如果将在经济上强调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强调自由主义的贝尔视作老保守派则显得不够准确。

亨利·艾肯(Henry D. Aiken)认为，贝尔提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思想的意识形态终结的背景意味着贝尔主张政治哲学的终结，因此他指责贝尔倡导了享乐主义哲学。应当说，艾肯在贝尔所用的书名“*The End of Ideology*”的 Ideology 上下足了功夫，他所发挥的“雄辩的终结”“哲学陈述的终结”“政治抽象的终结”“诗歌的终结”“形象语言的终结”也合于贝尔批判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思想源泉严重枯竭的状态。然而，贝尔的公众家庭方案无疑是具有政治哲学意蕴的，“现代公众家庭必须为它的两个任务提供规范的政治哲学：(1)规定共同利益——这是古典城邦的古老难题；以及(2)满足个人和群体提出的各自权利和欲求”^③。因此，艾肯对贝尔提出政治哲学的终结，主张享乐主义哲学的论断显然有失公允。

如果说艾肯从破坏性的角度看待贝尔的工作，詹姆逊则从建设性的角度看问题。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中

^①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严蓓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52.

^②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严蓓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51.

^③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严蓓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65.